

“想像 (imagination)” 与中日文论的现代性

牛 月明

内容提要：“文学”与“想像（像）”在中国文化中成词较早，但并不相互解释，而它们之间的相互解释正是新文学观念转换的开端与关键。“想像（像）”作为概念的能指进入中国学院文论的核心，与日本因素密切相关，这其中掺杂着被动接受、暗中置换、增殖变形、对话互动、主动选择、重新发现等文化现象，它浓缩了西-日-中的学术影响与选择模式（学西而借东，又常自我作主），展示了东学与西学、汉字文化圈内部复杂的文化交流景观。

关键词：想像 文学观 中日文论 概念史

一、缘起：“想像（像）”与文学的现代性

钱钟书曾嘲笑过胡适《中国白话文学史》和周作人《新文学的源流》是“事后追认先驱（prefiguration retro active）的事例，仿佛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¹。这种现象在中国文论界也普遍存在，比如“文学”与“想像（像）”相互解释的问题。

“文学”与“想像（像）”在中国文化中成词较早，但并不相互解释，而它们之间的相互解释正是新文学观念转换的开端与关键。钱钟书曾认为：“至民国之新文学，渊源泰西；体制性德，绝非旧日之遗，为有意之创辟，非无形之转移，事实昭然，不关理论。”²类似的看法鲁迅在《门外文谈·不识字的作家》（1934）中也谈到：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我们讨论中国“文学”（literature）观念的现代性，是不能以 literature 汉译为“文学”为起点的，而应该从“文学”与“想像（像）”等概念相互解释开始，因为古代汉语语境里的“文学”与西洋语境里的 literature 都有太多、太复杂的所指。“文学”“想像（像）”虽然是中土固有的词汇，但用“想像”“形象”“象征”等概念来界定的“文学”，却与洋学（西洋与东洋）密切相关。

这样的看法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渊源”地和“输入”地的文学理论教材中找到书证和支持（东洋书证见后），例如：

¹ 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189—190页。

² 钱钟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第490页。

韦勒克、沃伦：“‘文学’一词如果限指文学艺术，即想像性的文学（imaginative literature），似乎是最恰当的”³

伊格尔顿：“文学”（literature）一词的现代意义直到 19 世纪才真正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晚近的历史现象：它是大约 18 世纪末的发明，因此乔叟甚至蒲伯都一定还会觉得它极其陌生。首先发生的情况是文学范畴的狭窄化，它被缩小到所谓“创造性”或“想象性”作品之上……到了浪漫主义时代，文学实际上已经是在变成“想象性”的同义词：写那些不存在者似乎比描述伯明翰或记录血液循环更激动人心也更有价值。“想象性”（imaginative）一词在意义上的暧昧就暗示着上述态度：它既带有“假想的”（imaginary）这个描述性的词的泛音，意为“字面上不真实的”，但当然也是一个评价性的词，意为“赋有远见的”（visionary）或“善于创新的”（inventive）。⁴

希利斯·米勒：“既然文学指称一个想象的现实，那么它就是在施行（performative）而非记述（constative）意义上使用词语。……文学中的每句话，都是一个施行语言链条上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象域。词语让读者能到达那个想象域。这些词语以不断重复、不断延伸的话语姿势，瞬间发明了同时也发现了（即“揭示了”）那个世界。”⁵

伊瑟尔：“文学文本，如我所证明的，产生于现实、虚构和想象之间合三为一的关系。它是现实与虚构的混合，并由此而启动既定的与想象的两者的相互作用。虚构化行为引发了两个不同的程序。再生产的现实被用于暗示其自身之外的一个‘现实’，而同时那想象的则反过来被诱以形式化。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个越界现实的决定性被超越了，想象的发散性被要求显出为定型的东西。于是，文本之外的现实汇入想象，而想象也汇入现实。”⁶

“想象（像）”是谈论文学者最常使用的概念之一，有学者把“想像”作为日本人赋中国古典词以新义的外来语收入词典，但至今尚未有概念史、知识考古意义上的深入追究（钱钟书先生曾在语源学角度进行过努力，但缺乏中-西-日-中线路上的考察），这就足以说明此问题的难度与复杂程度。

理想的中国文论“新学语”（关键词）的知识考古、概念史研究，涉及到其在中-西-日-中的生成、传播与普及等诸多方面，它需要多语种的词汇史、文化交流史、学科史、社会思潮传播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跨学科、跨国境的大量书证。因此，全球视野的概念史和知识考古更需要接力研究与共同研究，特别是在中日文论同形概念方面。笔者目前引入这一话题有两个企图：1、体验中国文论“新学语”深度研究的困难及可能途径，如有可能希望本研究成为“想象（像）”概念史接力研究中的一环。2、借此深化对新文学兴衰和中国文论发展史的认识。

以古代文论的专业背景去观照现代文学理论的观念与知识，会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巨大差异和难于通约，困惑于古今文论巨大知识差异的形成过程。现在，中国有 1300 多个中文系，有数万

³（美）韦勒克；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 11 页。

⁴（英）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 17—31 页。

⁵（美）希利斯·米勒著：《文学死了吗》，秦彦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 57 页。

⁶（德）伊瑟尔著：《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陈定家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第 5 页。

人(不少于 3 万人)从事与文学理论相关的教学与研究, 有不计其数的学生与爱好者接受文学理论的教育, 但我们对古今文论巨大知识差异的形成过程的研究还不到位, 对学科史意义上的概念演进研究还有很大的欠缺。特别是从语源学、知识考古学的角度对中国文论“新学语”(关键词)文化记忆的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 尽管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99 个词》(2003); 廖炳惠《关键词 200: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2003); “文化研究关键词丛书”(2005); “关键词丛书”(2006); 《西方文论关键词》(2006); 《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2007); 《文化研究关键词》(2007)等出版物可供参考。但很多对于中国文论来说更为核心的一些关键词(如“想像”等)没被收入, 收入的一些词也被简单化或忽视了传播的中间一环。近现代文论交流中, 非常独特的西-日-中的学术影响与选择模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里想集中讨论的是作为“新学语”的“想象(像)——imagination”概念进入中国文论的基本过程。具体设想为:

- 1、在汉语的知识谱系中, “imagination”是如何激活(或嫁接为)“想象(像)”的?
- 2、“imagination”与旧有“想象(像)”之关系(继承、冲突与互动), “想象(像)”是如何获得新的重要性的?
- 3、新文学观念的提倡者为什么重视“想象(像)”? 有没有工具层面和目的层面的不同考虑?
- 4、少数人的“想象(像)”认知如何获得、变成广泛的社会知识认同。
- 5、“想象(像)”作为概念能指是怎么进入中国文论核心的? 特别是怎样进入学院文论的基本范畴中的? 其中日本因素是怎样发挥作用的?
- 6、“想象(像)”进入中国文论核心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接受条件与抵抗?
- 7、“想象(像)”的所指有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显然, 如此设想的实现尚有待相当长期艰辛的努力。这里必须重复一下老生常谈的意见, 学术研究是一个接力的过程, 学问有一个往复与进步的过程, 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无疑于痴人说梦, 鉴于本研究对繁多语种与资料(书证)的严格要求, 研究者也只能将眼光限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但认真地跑好每一棒, 都会支持着目标的到达。

二、“imagination”对“想象(像)”的激发——早期辞典中的“想象(像)”

在中国古代诗文评中, 与现代汉语中“想象(像)”所指相通的概念并不少, 著名的如: “兴”(孔子); “意想”(韩非子); “神思”(刘勰)、“沉思”(《昭明文选》)、“兴象”(殷璠)、“妙悟”(严羽)等, 一般的如: “兴会”、“苦思”、“凝思”、“妙想”、“精思”、“妙思”、“思”、“意”、“悟”、“体会”、“设想”等, 但现代文学理论最终使用的能指是“想象(像)”而不是其他, “想象(像)”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属于并不鲜见的词汇, 现在可以检索到的可达 7、8 千条之多, 但在传统的中国文论——诗文评中却属于鲜见的词汇, “想象(像)”作为概念能指是怎么进入中国文论核心的? 特别是怎样进入学院文论的基本范畴中的? 考察“想象(像)”作为概念能指进入学院文论建构的过程, 首先需要考察“imagination”是如何激活(嫁接为)“想象(像)”的。而要

找到这种嫁接的书证, 就应该先从早期汉英、和英字典谈起。

1、早期汉英字典的对译情况

(1) 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5—1823 印行)

19 世纪初, 大体是西方近代“文学”兴起、殖民主义东侵、中国社会发生近代转型的时期, 基督教宗派之一的新教继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清耶稣会之后第四次入华, 其先锋是英国伦敦布道会派遣的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他来华之前曾在英华人容三德学习过中文和儒学, 布道会给马礼逊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后继的传教士们编一本学习汉语的辞典。1807 年 1 月 31 日, 二十五岁的马礼逊登上“雷米顿兹号”货船取道美国前往中国, 同年 9 月 4 日到达澳门, 9 月 8 日到达广州。在这里, 他勤奋学习中文, 并着手汉译《圣经》、编写《华英字典》及一系列介绍中国的书。《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分三部, 第一部分名《字典》, 依据嘉庆十二年刊刻的《艺文备览》进行英译, 按汉字笔画分成二百十四, 个字根排列, 汉、英对照, 书后还附有字母索引, 1815 年在澳门印行; 第二卷的第一, 分在 1819 年, 行, 书名为《五车韵府》, 是按汉字音序 (根据音标按英文字母编排) 查字法排列, 实为汉英字典, 分为两册。1820 年续出第二卷的第二部分, 在附录中把汉文书写体按拼音分别将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古文六大类列出。第三卷于 1822 年印行, 书名为《英汉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第 6 卷), 内容包括单字、词汇、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全书编写历时十五年, 于 1823 年出齐, 共六大本约四千五百多页, 这是汉字文化圈出现的第一部大型英汉、汉英字典。

在《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四卷 701 页“想”字条目中, 有马礼逊对“想像”一词的英译: the image of a thought, an idea (一个思想形象, 一个想法); 但在第二卷 131 页“心”字条目中, 有马礼逊对“心思”一词的解释: the thoughts of the mind, denotes something of an inventive imagination (心灵、思想, 是指一个创造性想像的事情)。另外, 在第一卷 896 页 (电子文档在 923 页) 索引中有 imagination 的条目: Imagination of the mother affects the child, 717, 在 717 页 (电子文档在 744 页) 谈中国古代神话——姜嫄生后稷的故事, (见《史记·周本纪第四》) 时, 也是在“创造性想像”意义上使用 imagination 的。

可见, 在 1815 年印行的《华英字典》中, “imagination”虽然没有直接对译为“创造性想像”, 但“imagination”作为“心思”的一种, 其“创造性”的意思表示已经明白无误了。需要指出的是, 大致与马礼逊将“imagination”对接为“心思”的同时, 他的同乡格勒律兹正在努力的辨析想像、幻想、记忆的不同。

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开启了中英概念对译的道路, 以后新教传教士编纂汉英辞书大都是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基础上修订发展而成的。重要的如: 卫三畏 (W. William, 1812~1884) 的《英华韵府历阶》(1844 年澳门出版, 笔者未见)、麦都思 (W. H. Medhurst, 1794~1857) 的《英华字典》(1847~1848 年出版)、罗存德 (W. Lobscheid, 1822~1893) 的《华英字典》(1866~

1869 年出版) 等等。其中麦都思、罗存德等人的辞典还东传幕末和明治间的日本, 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 (如 1862 年出版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7 年出版的《和英语林集成》、1873 年出版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1881 年出版的《哲学字汇》、1883 年出版的《英和字汇》等) 所借鉴。其中不少汉字新语本是幕末和明治间日本从入华传教士编纂的汉外辞书中借取的, 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又被作为和制汉语输入中国。

(2) 麦都思的《汉英字典》(1847~1848 年印行)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4~1857), 亦译名为米赫斯, 中文名华陀, 字显理。英国伦敦人, 鸦片战争期间, 曾担任英军翻译。1843 年定居上海, 创立墨海书馆。1844~1860 年间, 墨海书馆出版书刊 171 种, 其中宣教书 138 种, 科技及史地书 33 种。中国学者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张福僖等曾在著译西书中发挥过笔录、润饰作用。麦都思通中国、日本、朝鲜、马来语言文字, 能操福建方言。编有中、朝、日、英字汇和闽音字汇, 1853 年 9 月, 创办在香港的首家中文报刊《遐迩贯珍》月刊, 是我国近代第一个以时事政治为主的刊物。

麦都思的《汉英字典》(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261 页对“想像”一词的英译是: the image of a thought, an idea (一个思想形象, 一个想法); 与《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第四卷 701 页“想”字条目中对“想像”一词的英译一致, 应来自马礼逊编译《华英字典》, “imagination”没有仍然对译为“想象(像)”。但麦都思的《英汉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in two volumes) 704 页: “imagination”对译为“思想之才”, 就赋予了“创造性想像”的含义。但 699 页“想像”的英译仍然是: the image of a thought。

(3) 罗存德的《华英字典》(1866~1869 年印行)

现在真正有据可考将“imagination”对译为“想象(像)”的较早书证首先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其次是 1869 年在上海印行的《和译英辞书》, 然后是在 1872 年印行《和英语林集成》。1868 年印行的《英华字典》987 页 23 行, 将“imagination”对译为: 幻想、虚想、甕想、想像、想头、意思; 并在“想像”前标明: “conception image in the mind”。

“1854 年 12 月, 罗存德作为汉语和德语的翻译与卫三畏等一同随阿达姆率领的第三次日本远征舰队前往日本, 参与日美和约的换文签字活动。这时, 他向日本负责翻译的堀达之助赠送了麦都思的两种辞典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1842-1843),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47-1848)”。日本堀达之助编《英和对译袖珍辞书》(1862 年印行; 堀越龟之助“改正增补”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 1866 年完成、1869 年印行), 主要参考英荷辞典、兰日辞典, 吸收了大量兰学译词, 稍晚的《和英语林集成》(1867 年印行), 以和语为主, 汉字词较少。虽无法胜任明治初期英语书籍的翻译, 但是最早真正意义上的英和辞书, 罗存德《英华字典》出版时, 正值日本的兰学家转学英语之际, 罗存德接受了来自日本的大量订单, 故对日本词汇史的影响巨大。⁷

⁷ 沈国威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 中华书局, 2010, 第 107, 128 页

2、早期和英字典的对译情况

日本学者对“想象(像)”概念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是齐藤静在 1967 年 8 月篠崎書林出版的『日本語に及ぼしたオランダ語の影響』一书的 270 页,谈到了“想像力”概念的来历,他认为:“想像力”是オランダ語“*verbeeldingskracht*”的直译,首见于 1857 年印行的《扶氏经验》,其意义与德语的 *phantasia* 相当。

二是惣郷正明和飛田良文在東京堂出版的『明治のことば辞典』,其 324-326 页列具了各种辞典对“想像”的翻译,其最早书证是庆应四年(1868 年,明治元年)的《英法单语便览》有“*imagination*”一词,但并没有与“想像”对译;其后出现的书证都在罗存德《英华字典》“*imagination*——想像”对译之后,不具有首证的价值。因此,将“想像”归类于明治のことば,证据是有问题的,尚显得有些草率与仓促。

三是平林文雄在 1983 年 4 月明治書院出版的『講座日本語の語彙⑩』302-306 页及在 1985 年 5 月和泉書院出版的『国語学研究論考』79-90 页,以及 1983 年 3 月『群馬県立女子大学国文学研究』第三期 11—29 页,谈到了「想像」概念的来历。(参见“东洋文学观念中的“想像”的引入”部分)。

四是 1992 年渡部昇一編集代表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的『ことばコンセプト事典』1016-1025 页平野和彦撰写的“想像”部分。

平野和彦在『ことばコンセプト事典』中提供的书证时认为 1862 年印行的《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已经有了与“思考、想像”相对应的译语(渡部昇一編集,第一法規出版株式会社,1992 年 12 月,1016-1025 页),但相对应的译语是“*imagination*”还是“*image*”他没有列具,『明治のことば辞典』324-326 页也未列入,尚有待查证。但在平野和彦并未列举的 1869 年上海印行的《和译英辞书》中,确已把“*imagination*”对译为“考思、想像”了。平野和彦列举的 1872 年印行《和英语林集成》中“想像”相对应的译语则是: *fany, imagination or image of anything in the mind, idea.* (平野和彦在『ことばコンセプト事典』1021 页)。

伴随着日本“新汉语”的急剧增长,明治中后期又开始致力于“新汉语”的规范化,《哲学字汇》(1881 年出版;以后又多次修订重版)等术语集便是人文领域“新汉语”规范化的实绩之一。东京大学教授、哲学家井上哲次郎(1855-1944)等人以英人威廉·弗列蒙(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典》(*The Vocabulary of Philosophy*)为底本编纂而成,明治十四年(1881)由东京大学出版。明治十七年(1884),井上和贺长雄(1860-1921)的改订增补版由东洋馆书店出版。大正元年(1912),丸善刊行井上和中岛力造(1858-1918)、元良勇次郎(1859-1912)修订的三版。《哲学字汇》是日本第一部哲学词汇集,虽只是条列译词,但范围不限于哲学,更遍及幕末到明治初期急速发展的思想、伦理、法学、政治、经济等人文、社会学科的专门用语,集理论性抽象语之大成,对近代语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本《哲学字汇》中,“*imagination*”与“想像力”是单向对应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 1905 年出版的《普通术语辞汇》用四页的篇幅对

“想像”所对应的德语 Phantasie, Einbildungskraft 英语 Imagination 详加解释, 标志着“想像”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日本的定型。

三、“想象 (像)”是如何获得新的重要性的?

在诸多中国古代文论的类编中, 在“想象 (像)”的条目下排列着大量的名人名言, 由此可知, “想象 (像)”概念所指的普遍性。可这不过是颠倒的发现与回溯性整理, 缺少对“想象 (像)”作为概念能指历史——历时性建构的考察, 这通常会模糊掉一个世纪以来, 现代人前仆后继用“想象 (像)”等概念来标识新文学现代性的努力。

用“想象 (像)”等作为概念能指来解释文学, 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观念, 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 而是被教育出来的, 是在 20 世纪初期特定的历史环境 (中国传统知识, 在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和外来压力面前失去了解释世界、应对危机、提供价值标准和维护信仰的能力后) 中人们吸收、借鉴东洋、西洋“literature”理论的结果。简单的讲, 译词“文学” (Literature) 与汉语圈的原生诗文观念的区别就在于对创造性“想象 (像)——imagination”复杂性 (也许译为创意更合适) 的认识与强调。汉语圈的原生诗文观念, 强调声色性情, 译词“文学” (Literature) 强调思想、情感、想像、形式。声色与形式相当, 性情与思想、情感相当, 唯独“想象 (像)”, 是新加入的标识。

当然, 译词“文学” (Literature) 对创造性“想象 (像)——imagination”复杂性的认识与强调也有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1、西洋文学观念中的“imagination”

大体说来, 英语、法语的“imagination” (イマジネーション)、法语 fantaisie; (ファンタジー) 和德语 Einbildungskraft (イリュージョン) 来自古希腊人的 phantasia (ファンタシア) 和古罗马人的 imaginatio (イマーギナーテイオ)。

钱钟书认为“古希腊文艺理论忽视‘想像’, ……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一方面承认‘想像’是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 另一方面又贬斥它是理智的仇敌, 是正确认识事物的障碍, 把它和错觉、疯狂归为一类。‘家里的疯婆子’ (la loca de lacasa) 从十六世纪起就成为‘想像’的流行的代称词……十八世纪初, 维柯认为诗歌完全出于‘想像’而哲学完全出于理智, 两者不但分庭抗礼, 而且简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到了十九世纪, 随着浪漫主义运动的进展, ‘想像’的地位愈来愈高, 没有或者很少人再否认或贬低它的作用了……‘错误和虚诞的女主人’ (巴斯楷尔语) 屡经提拔, 高升而为人类‘一切功能中的女皇陛下’ (波德莱亚语)。”⁸

而十九世纪正是乔纳森·卡勒所说的“文学的现代意义的确立”的时期, 乔纳森·卡勒认为:

“如今我们称之为 literature (著述) 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述的著作。而 li-terature 的现代含义: 文学, 才不过二百年。1800 年前, literature 这个词和它的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

⁸ 参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第一版。

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的作品这个理解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确切的出处，那就可以追溯到 1800 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发表的《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On Literature Considered in its Relations with Social Institutions*）。”⁹

“我们谓之曰文学作品的创作已经有两千五百年历史了，然而，关于文学的现代思想，仅仅可以上溯两个世纪。直到 19 世纪，“文学”以及欧洲其他语言的类似说法，总体上仅仅意味着“文章”，甚至“书本知识”。在莱辛（Lessing）自 1759 年起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el）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简称《论文学》）则真正标志着文学的现代意义的确立”¹⁰而罗岗在转述乔纳森·卡勒的观点时，说“然而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的作品理解，是从 18 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家那里开始的”¹¹

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比较重视柯勒律治对想象和幻想的区分，第 124 页说：

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这个术语（想象；英语、法语的 *imagination*、法语 *fantaisie*、德语 *Einbildungskraft*）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其指涉含义也屡有变迁。然而，在通常的用法中，占主导的还是浪漫主义的想像观。柯勒律治关于想象与幻想的论述影响深远，本书将其有关选段置于前两个世纪发展的、基本上属于心理学范畴的历史语境中。

128—129 页：塞尔登认为，柯勒律治的想象力实际上是给感官观察附加了自己的“格调”和“氛围”，柯勒律治对想象和幻想的区分是他得以提出想象具有神的创造力的主张，而幻想只是记忆的一种变化形式：

它（记忆）必须从联想法则中获取所有的现成素材”，重新安排这些素材的艺术是诗歌的一种功能，但不足以解释天才。想像不仅仅意味着重洗一张张经验之牌；想像“分解、传播、消除，为的是进行再创造。

伊瑟尔在《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第四章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想象与其他范畴的关系，并对想象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就想象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对想象的认识，

⁹ 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第 22 页。

¹⁰ 参见《问题与观点，20 世纪，文学理论综论》乔纳森·卡勒论文学性，史忠义、田庆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3 页。

¹¹ 参见罗岗：《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认为想象是人的一种能力；第二，认为想象是一种行为；第三，把想象看做一种原始幻想。……想象并不是一种自为的潜能，它必须依靠主体（柯勒律治）、潜意识（萨特）、心理或社会历史（卡斯特里阿蒂斯）等因素起作用，这些因素并不包括发泄与刺激在内。”

20 世纪初，法国学者李博在《论创造性想像》一书中，论述了创造性想像这种特殊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它的能动性，它的理智的、感情的、下意识的诸因素，它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它的发展规律和它的不同类型等等。李博还特别论述了感情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感情因素作为创作的原动力和感情状态作为创作材料的双重作用。至此，具有现代新义的“想象”(imagination) 概念基本独立成型。（参见《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版。）

创造性“想象（像）——imagination”复杂性（也许译为创意更合适）在于：它要从现象、具象（现实刺激物）出发经六根经验到心象、印象，再经分解、综合、简化、繁化、突出、变形、抽象、陌生化等手段形成新的意象、形象与象征，其中渗入了个性、直觉、灵感和天才成分。最后还要经过符号化，变成可供把握的文本。

2、东洋文学观念中的“想像”的引入

（1）平林文雄的书证

平林文雄在 1983 年 4 月明治書院出版的『講座日本語の語彙⑩』中，首先在汉语知识谱系中，考究了“想像”的来源，并举出楚辞、谢灵运、欧阳修的书证。其次证明明治以前的汉诗文里，同样有使用“想像”的书证。但同时平林文雄也认为，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想像”，是幕末或明治时期输入西学的结果。这种说法是有证据可寻的，例如：西周的“美妙学说”中的“想像力”，中村正直的《西学一斑》中的“想像”，织田纯一郎译《花柳春话》（明治 11 年）中的“想像”就是“imagination”明确的对译；明治 14 年井上哲次郎的《哲学字汇》（1881 年出版；1884 年增补），“imagination”的译语就只剩“想像力”一个了。

毫无疑问，“想像力”是一个和制汉语，但如果说“想像”，是幕末或明治时期再生的新概念，则需要说明“想像”的现代意义是什么，新在何处，平林文雄提出了“想像”作为新概念的几个特征：第一，“想像”世界与现实世界不同，是超越现实的创造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与空想有相通之处。第二，“想像”与知觉、思考、记忆不同，知觉、思考、记忆接近现实经验并且被动地把握或再现这些经验，而想象完全是一种自由自发的创造性活动，注重直观性、个性与感情价值等。那么，在中国古代典籍 7、8 千条的“想像”书证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新义，其实是需要审慎论证的。

（2）《日本文学史》的书证

明治二十三年（1890 年）十月，由三上参次（1865-1939）、高津辙三郎（1864-1921）合著的《日本文学史》，由东京金港堂刊行，这是日本第一本公开出版的国家文学史著作。作者根据

西方“纯文学”(pure literature)概念对“文学”进行重新定义:文学乃指以某一文体,巧妙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想象者,兼具实用与快乐之目的,并传授大多数人大体上之知识者。¹²

(3) 太田氏概论的书证

近代日本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译介、输入,约始于明治十年前。据日本学者自己的梳理,相继以西洋修辞学(西周、菊池大麓)、西洋美学(费诺罗萨;中江兆民;森鸥外、石桥忍月;高山樗牛、登张竹风、生田长江)、西洋文学论及文学史研究(贺长雄之、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金子马治、岛村抱月、内田鲁庵、高山樗牛、后藤宙外、夏目漱石、小宫丰隆、芥川龙之介、厨川白村、太田善男等)三个方向层累地推进,至明治二十年左右,才各自逐渐获得分途发展。

太田氏概论上编“文学总论”,将文学置于艺术美学总纲之下,藉将艺术定义为“通过想象,将自然理想化而成美的制作”,而为文学的性质、职能奠定基调;又通过对艺术生成过程的构拟,将艺术的构成设定为摹仿、选择、理想化、变形、创作五大要素,据此进而阐述文学的意义、特质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区分、理想主义与写实主义描写态度的区分等;

(4) 本间氏概论的书证:对包括想像在内的文学四要素的认可。

据毛庆耆、董学文、杨福生合著《中国文艺理论百年教程》考证,《新文学概论》前编1919年由章锡琛翻译出来,1920年分章刊载于《新中国》杂志上;1924年章氏又将后编译出,刊载于《文学》杂志上;1924年又有汪馥泉的译文载于《民国日报》“觉悟”栏目。《文学概论》1930年仍由章锡琛译出,并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多次再版。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1925)是中国最早的一本文学理论译著。本书数年之内出了四个版本,且再版数累至六次,故影响较大。本间久雄《文学概论》的框架和材源都主要来自对温切斯特的《文学批评原理》和哈德森的《文学研究入门》两部西方著作进行借鉴、挪用以及融会的产物。——虽然全书也点缀着一些当时流行的其他西方理论,如居友的文学社会学、丹纳的文学进化论、王尔德和沛特的唯美主义思想、鲍桑葵的表现主义美学等——这使得该书成为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大杂烩。

鲁迅在1927年就敦促青年学生,要“研究文学”尤其是新文学,就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入手¹³

3、中国新文学观念中的“想象(像)”的引入

中国新文学观念中的“想象(像)”——引入、抵抗、强化、弱化,这是一个可以从近现代文学批评史、文学史学史、文学概论教材史、文艺争鸣史和近现代辞书史等方面一直作下去的大题目。限于篇幅,此处只列举最早书证。

¹² 三上参次,高津楸三郎:《日本文学史》东京:金港堂,1890;这里转述来自于《“文学”译名的诞生》湖北大学学报,2009.5期;另外,余来明;孟庆枢《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06.5译为:“所谓文学乃是某种文体,巧妙地表现人的生活、思想感情,想像兼有实用、娱乐之目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能传布大体的智识。”

¹³ 鲁迅全集(第3卷)而已集·读书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鲁迅所谓“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 Literature 的译名”的文学，按新村出编《广辞苑》的解释是：日本的“文学”概念，在明治西学输入之前，其义主要来自中国文化，用于泛指一般的学问、学术；西学输入后，逐渐演变为指以语言表达想象力和情感的艺术。¹⁴

(1)、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批评中“文学”与“想象（像）”相互解释的开端。

《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丽，是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骑驿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2)、黄人《中国文学史》：文学史中“文学”与“想象（像）”相互解释的开端。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时间大体与林传甲不相上下，但文学观却相距甚远。黄人《中国文学史》有关文学的定义取自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太田善男把文艺定义为：“通过想象，将自然理想化而成美的制作”。黄人《中国文学史》中有关文学定义的探讨，除起首一段追溯“文”之名词在中国早期历史上的义项演变出自黄人自述外，皆分别译自太田氏《文学概论》第三章“文學の解説”之第一节“文學の意義”、第二节“文學の特質”、第三节“文學の要素”。

(3)、周作人的“意象”：《文学概论》中“文学”与“想象（像）”相互解释的开端。

如果把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美学文艺学的开端，那么，周作人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就应该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概论的开端。其中有言：“原泰西文章一语，系出拉体诺文 Litera 及 Literatura 二字，其义至杂揉，即罗马当时亦鲜确解。挹实图用称文字之形，阔迭廉以文谱为 Literatura，而昔什洛则以总解学问之事。¹⁵盖其来既久远，又本无精当之释义，故至今日，悬解益纷，殊莫能定。举其著者，则如倭什斯多(Worcestor)曰：“文章者，学问(Learning)知识(Knowledge)意象(Imagination)之果，借文字为存者也。”¹⁶

周作人译自宏德的三层五因说值得文艺学研究者注意：

“文章中有不可缺者三状，具神思、能感兴、有美致也。思想在文，虽为宗主，顾便独在，又不能云成，如巴斯庚所前言是矣。夫文章思想，初既相殊而莫一，然则必有中尘(Medium)焉，为之介而后合也。中尘非他，即意象、感情、风味三事(即顷所举三状之质地)合为一质，以任其役，而文章之文否亦即以是之存否为衡。盖抽思为文，使不经此，则所形现者将易于混淆，更无辨于学术哲理之文矣。故文章者，意象之作也。巴德勒又言，文章实合事迹灵明而成形。是犹言文字之中有一物焉，足以令读者聆诵之余，悠然生其感想，如爱诺尔德云须有兴趣是也。以上所言，多关神思、感兴二状。至言美致，则所贵在结构，语其粗者，如章句、声律、藻饰、铬裁皆是，若其精微之理，则根诸美学者也。集是三者，汇为文章，斯为上乘，文人之流品亦视此而

¹⁴ 《广辞苑》“文学”条，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2288页。

¹⁵ 有日本论者根岸宗一郎据此认定周作人受了太田善男的影响

¹⁶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94页

定之。夫世果有覃思善感之人，而不著之文，则不可见，或著之矣，无神思以为中尘，斯其业亦败。且文之有待于能感也，读书一过，泊如枯灰，无取焉矣，而风味调和之要，尚为之殿焉。苟其无是，虽他德既具，犹为未文，而况浇世寡情绝采之作乎？”¹⁷

四、几点看法：

1、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作为近代意义上“literature”译词的“文学”概念已经熟悉到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程度，但一段时期以来“literature”理论的发源地却不断发出“文学死了”的声音，有人惊愕、有人愤怒、有人不屑，争论与质疑也往往不在同一层面（体相用）进行，因此，现在到了将“自然而然的”、“不言自明的”还原为“人为的”、“建构的”时候了。我们讨论中国“文学”（literature）观念的现代性，是不能以 literature 汉译为“文学”为起点的，因为古代汉语语境里的“文学”与西洋语境里的 literature 都有太多、太复杂的所指。现代意义上“文学”（Literature）观念的重构来自于洋学对“想象”（“imagination”以及虚构、创造、内指）与“想象性”（imaginative）异乎寻常的关注、重视与强调，“文学”虽然是中土固有的词汇，但用“想象”“形象”“象征”等概念来界定的“文学”，却与洋学（西洋与东洋）密切相关。

2、“文学”与“想象（像）”在中国文化中都成词较早，但并不相互解释，而相互解释是新文学观念转换的开端与关键。新文学“体制性德”之新，可以具体为三个层面：在性的层面，新在对总体性（民族国家、国民精神、国民性、时代精神、生活本质）的想象。在德的层面，新在对创造性想象复杂性的认识。在体制层面，新在对小说等想象性文体的重视。这三个层面都与“想象（像）”的概念密不可分。近年来文学之死话题的讨论，一般限定在性的层面才有价值，应该提倡性情之动、声色之美、想象之新的文学观。

3、“想象（像）”概念的激发、引入、抵抗、强化、弱化过程，是中国现代文论发展史的缩影，渗透着意识形态的深度介入。在上世纪之交，一方面，由于亡国灭种的现实威胁所激发出的对“共同体”的想象，多承载于文学之中。另一方面，人们也多是通过文学与一个突然出现的“新”世界发生着想象性联系。所以，现代教育制度迅速将“想象”性写作构成的文献纳入其中，推动了学院文论的多元建构。本世纪之交，把作为文学性标识的“想象（像）”概念弱化为创作过程的阶段性概念，会加剧对中西文论交流理解的难度。

4、“想象（像）”作为概念的所指，其成立、变化、分化有一个纠结复杂的过程，是汉字文化圈的共同创造，“想像力”是“和制汉语”，但将“想象（像）”纳入其中，则显得有些草率与仓促，证据是有问题的。然而“想象（像）”作为概念的能指进入中国学院文论的核心，与日本因素密切相关，这其中掺杂着被动接受、暗中置换、增殖变形、对话互动、主动选择、重新发现等文化现象，它浓缩了西-日-中的学术影响与选择模式（学西而借东，又常自我作主），展示了东学与西学、汉字文化圈内部复杂的文化交流景观。“象”及其衍生概念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底蕴（性分名动、义

¹⁷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一卷 98 页

兼心物)，又架构于外来文论的知识体系，虽然避免了完全的“失语”与文化“断裂”，但也加剧了语义的纠缠和理解的难度。

5、新汉语的复杂性在于它既非日本语言学所谓的“新汉语”——和制汉语，也非笼统的现代汉语，其构成成分比较复杂：有创造的、有改造的（形同义异）、还有概念化的，以及被外力激发、借助外力普及定型的。高明凯、刘正琰《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1958）、刘正琰等《汉语外来词辞典》（1984）中，包括“想象（像）”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日源词归类需要重新思考。理想的中国文论“新学语”（关键词）的知识考古、概念史研究，涉及到其在中-西-日-中的生成、传播与普及等诸多方面，它需要多语种的词汇史、文化交流史、学科史、社会思潮传播史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积累，需要跨学科、跨国境的大量书证。因此，全球视野的概念史和知识考古更需要接力研究与共同研究，特别是在中日文论同形概念方面。

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

本会は、16世紀以降の西洋文明の東漸とそれに伴う文化・言語の接触に関する研究を趣旨とし、具体的には次のような課題が含まれる。

- I. 西洋文明の伝来とそれに伴う言語接触の諸問題に関する研究
- II. 西洋の概念の東洋化と漢字文化圏における新語彙の交流と普及に関する研究
- III. 近代学術用語の成立・普及、およびその過程に関する研究
- IV. 欧米人の中国語学研究（語法、語彙、音韻、文体、官話、方言研究等々）に関する考察
- V. 宣教師による文化教育事業の諸問題（例えば教育事業、出版事業、医療事業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 VI. 漢訳聖書等の翻訳に関する研究
- VII. その他の文化交流の諸問題（例えば、布教と近代文明の啓蒙、近代印刷術の導入とその影響など）に関する研究

本会は、当面以下のような活動を行う。

1. 年3回程度の研究会
2. 年2回の会誌『或問』の発行
3. 語彙索引や影印等の資料集（『或問叢書』）の発行
4. インターネットを通じての各種コーパス（資料庫）及び語彙検索サービスの提供
5. (4)のための各種資料のデータベースの制作
6. 内外研究者との積極的な学術交流

会員

本会の研究会に出席し、会誌『或問』を購読する人を会員と認める。

本会は、言語学、歴史学、科学史等諸分野の研究者の力を結集させ、学際的なアプローチを目指している。また研究会、会誌の発行によって若手の研究者に活躍の場を提供する。学問分野の垣根を越えての多くの参集を期待している。

本会は当面、事務局を下記に置き、諸事項に関する問い合わせも下記にて行う。

〒564-8680 吹田市山手町 3-3-35 関西大学文学部中国語中国文学科
内田慶市研究室 (Tel.ダイヤルイン 06-6368-0431)

E-mail: keiuchid@pp.ij4u.or.jp

URL: <http://www2.ipcku.kansai-u.ac.jp/~shkky/>

UPL: <http://we.fl.kansai-u.ac.jp/>

代表世話人：内田慶市